

“三融入”背景下的华侨学校变迁研究

——以广西桂林华侨农场为例

李莫娴

摘要:桂林华侨农场的学校成立于1960年,其成立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归侨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经过60多年的发展,华侨学校的教育发生重大的变迁。2007年“三融入”体制改革提出后,华侨学校教育在“三融入”背景下实现新的变迁,教育管理、教育体制和经济来源成为华侨学校发展的主要内核,“三融入”体制改革过程消除了来自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元因素所导致的教育文化差异,对于华侨学校而言,这一改革是“脱胎换骨”般的变迁,同时使得华侨学校实现了更深层次地融入当地社会。

关键词:华侨学校;变迁;三融入;归侨;桂林华侨农场

作者李莫娴,南宁理工学院图文信息管理中心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华侨华人、侨乡文化。
地址:南宁市,邮编530006。

引言

华侨农场相关研究的论著,有许金顶和姜泽华的《改革与融入——华侨农场体制研究论文集》^①,该书整理历年有关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相关研究论文及课题报告汇编成册,阐述新中国以来归侨的安置管理以及“三融入”体制改革。《中国华侨农场史主卷》^②记述了中国84个华侨农场发展历史以及华侨各项事务活动等各个方面。赵和曼编著的《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③是深入地方侨史的著作,对于广西籍华侨华人的相关概况有着完整的叙述,是研究广西华侨华人及相关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郑一省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华侨农林场归侨研究》^④筛选的论文,选题内容丰富,总体方向始终以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广西世居民族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为主,同时也兼顾其他方向的研究,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还有其《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⑤,本组论文以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探讨了归侨的认同、归属感的产生与建构,以及生计变迁等问题。陈仁芬的《广西华侨农场子弟学校的发展研究——以桂林、来宾华侨农场子弟学校为个案》^⑥对

①许金顶、姜泽华:《改革与融入华侨农场体制研究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主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

④郑一省:《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华侨农林场归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

⑤郑一省:《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八桂侨刊》2012年第2期。

⑥陈仁芬:《广西华侨农场子弟学校的发展研究——以桂林、来宾华侨农场子弟学校为个案》,《八桂侨刊》2006年第4期。

桂林、来宾两个华侨农场子弟学校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为广西华侨农场子弟学校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有关“学校变迁”研究的相关著作有高时良的《中国教育史论丛》^①,该书拓宽中国教育史研究视野,进一步挖掘我国珍贵教育遗产,对历代教育的管理机制与思想发展轨迹作些考证。张济洲的《文化视野下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地方社区基础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②以历史人学的视角,深度描写了教育权利深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过程,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其中的城乡差距的问题。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华侨农场的研究跨度较大,形成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局面,而学者们聚焦的方面则在于归侨安置,归侨的社会适应中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族群记忆,农场及归侨的经济发展,民族归侨的专门性研究,归侨口述历史,华侨农场与归侨史等方面。而且学者们在学校变革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涵盖了多样性和深度性的研究理论、视角、方法和结论。然而,尽管已有广泛的研究,但是特殊类型的学校,如华侨学校,却很少受到关注。

2007年,国家针对华侨农场体制改革长期难以突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简称“三融入”)目标,推动华侨农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殊的体制模式已不复存在,归难侨群体的场员身份意识逐渐转变为村民、居民。华侨学校作为国家为归难侨设立的核心教育机构,以及华侨农场历史遗留的教育问题,其在学校变革方面的问题可能与其他学校存在不同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华侨学校的学校变革进行深入研究,华侨学校发展如何与“三融入”体制改革有效结合?本文意在厘清华侨学校变迁史前提下,拟探讨“三融入”背景下广西桂林华侨农场的华侨学校如何运用具有特殊性的身份来实现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教育群体和受教育群体又发生了何种变迁,及其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所呈现出何种特征。

一、广西桂林华侨农场建立及华侨学校的由来

广西桂林华侨农场,又称“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建立于1960年,是桂林唯一的华侨农场,也是桂林归侨的聚居地,主要安置1960年归国的印尼归侨以及1978年归国的越南归侨。桂林华侨农场的建立,是时代变迁与华侨归乡情怀交织的生动写照,华侨学校的建立,则是为了满足华侨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1960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接待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其中提到解决华侨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各地华侨农林场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小学和初中,并且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人员、设备和经费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以确保华侨子女能够就近入学。

(一) 桂林华侨农场的建立

广西桂林华侨农场坐落于桂林市七星区市郊,尽管地理位置在郊区,但它与传统的中国农村地区有所不同。中国行政区划严格按照省、县、乡三级划分,而桂林华侨农场在创立初期是脱离了地方管理体系,经过多次改革后逐渐实现了地方管辖,最终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1960年之后,由于国家安置归难侨的工作,这块地区被划分给了华侨农场以建立居所,安置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1980人;此后,华侨农场又在1978年安置了从越南回国的808人,以及从泰国、新加坡和柬埔寨回国的3人^③。

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是桂林市七星区下辖的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时也负责管理竹江村委会、敢兴村委会和马家坊村委会三个村委会。农场设有场部,共有25名编制内人员,场部负责管理农场

^①高时良:《中国教育史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②张济洲:《文化视野下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地方社区基础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③数据材料来源于笔者2022年7月21日在桂林华侨农场场部调研电子资料,摘抄于《桂林华侨农场介绍》。

的各项事务^①。由于桂林华侨农场成立之初场属范围较广,为方便归侨进行生产劳作,将农场分为十个生产队。现今为了生产生活方便,归侨与职工统一搬至场部所在地石门村一带居住。桂林华侨农场内部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基础设施,包含医院、幼儿园、中小学校、派出所、农贸市场、便利商店、文体活动中心等一系列生活设施,形成了一个能够满足归侨侨眷生活所需的小型社区。随着社会化的推进,在2003年以后,桂林华侨农场的派出所、医院、学校等社会福利机构交由桂林市七星区政府管理,所需经费列入七星区财政预算。

(二) 桂林华侨农场华侨学校的由来

1960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接待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其中提到了解决华侨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为此,广西在各华侨农场建立了中小学,以便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服务^②。1960年至1966年间,桂林华侨农场的华侨小学教育学校分别设有总部石门小学和分点小学鸡冠山小学、黄沙桥小学、马家坊小学和竹江小学,初中部有华侨中学。受当时政治运动影响,1966年华侨农场在鸡冠山成立了一所农业中学,以适应以工农为主的社会浪潮^③。

1. 华侨学校成立初期的管理归属和教师队伍建设

华侨学校创立初期是由华侨农场自行组织创办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学校遵循国家教育方针,确保学生能够获得与国内教育标准相同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华侨学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帮助归侨更好地适应国内教育的初步政策^④。

华侨学校在成立初期,由于归侨与周边村子语言上的差异,华侨农场形成相对封闭的状态。因此,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华侨学校主要依靠归侨担任教师。由归侨为主的教师队伍建设贯穿着归侨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传承。当时农场位于桂林市的郊区,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有知识和能力的教师很难被吸引,华侨农场也只能从农场有文化的归侨中聘请教师,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教师队伍建设不理想,很多教师没有合适的学历,因此教学水平与桂林市普通学校相比要低很多。况且有些老师同时需要授课多个学科,这进一步加重了教学负担。

2.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华侨学校

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国营企业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从1985年到2002年期间,学校的经费来源、教师配备等逐渐由农场企业自己负责,原本享有的优惠待遇宣告结束。

(1) 教育资金从区侨办拨款到农场企业负责

在过去,华侨学校可以从广西侨办获得资金支持,但是在这个新的阶段,由于学校无法依赖过去的资金来源,他们现在更加需要依靠农场企业自己提供的经费来运作。但是1991年农场企业亏损145.92万元^⑤,学校陷入了经济困境阶段,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发展,在教师流失和教学不稳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财政拮据,学校领导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经济来源来支持学校的运营和发展。因此,学校一些领导决定将学校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例如养鸡、养鸭等。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农业生产来增加学校的收入,以解决学校的财务问题。然而,学校领导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导致对学校的管理和发展的重视不够,对学生的关注和教学质量的监督不足,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质量无法得到有效提

^①数据材料来源于笔者2022年7月21日在桂林华侨农场场部调研电子资料,摘抄于《桂林华侨农场介绍》。

^②陈仁芬:《广西华侨农场子弟学校的发展研究——以桂林、来宾华侨农场子弟学校为个案》,《八桂侨刊》2006年第4期。

^③资料来源于笔者2023年3月24日与桂林华侨农场M先生访谈内容的整理。

^④资料来源于笔者2022年8月2日与桂林华侨农场X女士访谈内容的整理。

^⑤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主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升。这使得家长们对学校产生了质疑,不愿意将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就读。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学生数量下降,进而加剧学校的经济困难。

(2)教育资金短缺导致教师流失

华侨学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临着多重困境,包括教育经济缺失、教师供应不足、学生来源减少以及社会信赖度下降。在1998年左右,学校教职工工资长期停发,很多教师无法继续在学校工作,不得不选择离职寻找其他稳定的工作来维持生计。这些问题都对学校的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缺乏足够的教师和学生,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声誉。尽管学校采取了一些非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例如招募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职工,提供培训并让他们担任教师岗位,同时也鼓励毕业生留校任教,但是这些措施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并不能持续地保障学校的发展。

二、“三融入”改革驱动下的华侨学校变迁

2001年以后,华侨农场自办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院、公安派出所等社会服务机构应交由所在地区行署、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归口管理。在2003年,农场自办的公安派出所、中学、小学、卫生院等社会职能交由七星区政府管理,所有人员经费也全部列入七星区财政预算安排^①。

2007年,国务院出台文件,确立了推动华侨农场“三融入”的改革目标,实行新一轮的体制改革^②。随着安置任务的完成,华侨农场归侨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终将彻底脱离这种特殊的体制模式,华侨学校也完全脱离华侨农场的管理机制。

(一)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2003年学校脱离华侨农场归七星区政府管理之后,华侨学校的一切安排均根据教育局的要求实施。200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此决定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行国务院总体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发展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县(市)级人民政府真正担负。这一系列政策推进了华侨学校“以乡为主”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权限,让华侨农场及其周边村子成为负担教育经费的主力。2007年,华侨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

2010年学校在管理模式上建立以校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逐步实行“校、部、组”管理模式,即学校为校级领导,设有教学部、德育部、生活部等职能部门,同时设置多个小组,分别负责教学、德育、生活、后勤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此外,学校还建立了完善的财务、人事、招生等管理制度,实现了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在教育教学方面,学校通过引进现代化教育技术和管理理念,推行素质教育和多元化发展,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教育教学活动,如五育融合、科技创新等。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七星区进一步推进学区制管理改革工作,于2015年秋季学期成立了桂林市华侨教育集团,由华侨中学、桂林市华侨小学和桂林市竹江小学组成。集团化办学可以形成统一的“侨”品牌形象和发展理念,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资源。

华侨学校在管理上实现了以地方教育局领导管理,教育局下一级是华侨教育集团,再下一级是由校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这一管理模式是符合华侨学校发展的,它不仅有了大的领导方向,还细分到每个教育模块,这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减少资源浪费,为学生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机会。

^①《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华侨企业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桂政发(1997)28号)。

^②肖伊然:《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二)教育体制的变迁

教育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和管理教育的系统,它包括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机构和程序等。“三融入”体制的改革对推动人才市场的充分发展,为华侨学校的改革获得广阔的空间。

1.“兼侨”“并乡”的教育

在“兼侨”上,华侨学校建设了由侨史、侨乐、侨食等校本文化构成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其中,侨史课程包括了侨乡历史、侨乡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归侨夕阳红乐队”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侨乡传统音乐和舞蹈;“归侨美食节”则通过学习侨乡传统美食制作,让学生掌握基本烹饪技能的同时,了解和体验侨乡饮食文化。

在“并乡”上,华侨学校将本地化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中,包括地方性课程的建设和华侨学校与地方小学合并。地方性课程建设是学校及周边农村之间紧密联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华侨学校成为本地文化传承和教育的窗口和载体,提高了学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地理区域上,华侨小学与当地的敢兴小学进行了合并,这不仅在文化教育上进行了合并,更体现在“侨”与“乡”地缘上连接的现状。这种合并方式不仅可以加强学校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能够让华侨学生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和社会,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了解和融合。

2.“五育融合”促进“升学率”的教育

华侨学校融入地方社会教育,作为学校变革的一种社会背景,观念和社会制度是学校办学产生失范行为的重要外部致因。“教育依据功利的原则来完成对自身结构的重新建构过程,其结果是教育具备了某些功利形态。功利原则是一种理性的原则,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我们可以将功利原则简单地表述为效益最大化、追求实用性。种种迹象表明,现代教育越来越崇尚,或者说越来越依赖这些功利原则,并将其转变成教育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得教育具备功利形态。”^①

在这种氛围下,华侨学校不能袖视,把学生升学作为学校运作的核心,学校的教育活动开展以“五育融合”提高“升学率”。因此,华侨学校在人员物资、管理制度和学生活动等方面,向升学率倾斜。其中学生生活活动方面,华侨学校开展了“五育融合华侨好少年”特色评奖活动,其活动设置多个奖项包括“学习之星”“进步之星”“乐善之星”“勤奋之星”等,旨在鼓励学生全方位发展,肯定学生努力的价值,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从而在升学率上得以最直观的体现。

3. 自主招聘教师和引入支教教师

乡村学校的空间分布变迁首先表现为学校教师、学生在数量上的变化^②。“三融入”华侨学校教师的变化,一个是从最初大部分为归侨教师转变为非归侨教师;另一个是自主招聘教师。在“三融入”前,华侨学校教师一是区侨办委派,二是华侨农场招聘,现在是由华侨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团队,由更了解华侨学校情况的领导去挑选教师人才,形成了一支更适合华侨学校教育发展的教师团队。此外,除了自主招聘教师之外,还有一些支教教师为华侨学校带来了新鲜血液。以下是2010年,“三融入”改革后华侨学校的教师情况:

竹江小学,学校开设7个教学班,培养了一支拥有16位敬业精神强的教职工队伍,其中小学高级教师3人,小学一级教师10人,小学二级教师2人,教工1人;本科3人,专科10人,高中及中师3人^③。

华侨中学,学校有学生135人,内宿生110人,3个教学班。教职工18人,其中专任教师14人,本科学历

^①张兴锋:《教育功利化现象审视:工具理性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21期。

^②余丽君:《桂西地区乡村学校空间分布的历史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③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西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10人,大专学历3人,中专学历1人;中学高级教师1人,中学一级教师9人,中学二级教师4人^①。

华侨小学,有6个教学班,1个学前班,在校学生191人。有教职工16人,其中大专学历有14人,中师学历1人,初中1人;小教高级5人,小教一级10人,小教三级1人^②。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华侨学校的师资水平还是很好的。“三融入”改革后,华侨学校在国家各项资助、扶持政策下改善了教学设施和环境;“两免一补”政策提升了农场社区学生的学习条件,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的入学率;财政对教师工资的保证,极大地调动了老师的工作积极性。

4. 学生数量逐年递增

华侨学校办学初衷是服务归侨及其子女,随着时间的变迁,这种办学性质不得不发生改变。“三融入”后华侨学校招生的范围现在以学区为界限,学生的多元化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这种学区招生通常基于学生的家庭住址,这可能导致学校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出现差异。富裕社区的学校可能会获得更多资源和资金,而较贫困社区的学校则可能缺乏足够的支持。这种不平等会影响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机会平等。

表1 华侨小学2010年至2022年间教学班、教师和学生数量

时间	教学班	教职工	学生	时间	教学班	教职工	学生
2010	6	16		2017	8	21	283
2015	7	19	248	2018	12	29	426
2016	7	19	249	2022	12	33	489

以华侨小学为例,通过上述表格可以看出“三融入”改革后,学校的学生数量逐年递增,学生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知识的获取者,还是学校发展的推动者。学校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教职员工和管理层的努力,还与学生群体的参与和表现密切相关。学生群体对学校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学校管理层需要积极引导和激励学生,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们的积极作用,并采取措施来纠正潜在的阻碍因素,才能确保学校能够持续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

(三) 学校经费来源变迁

2003年华侨学校由七星区教育局接管,从场办学校转型为公办学校,其教育经费也由教育局全额拨款。这个影响是非常积极的,学校不需要依靠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可以专注于其核心使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2005年12月《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以“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为原则,将华侨学校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华侨学校义务教育经费,以此来提供其经费保障。为了让周边村子的学生顺利接受义务教育,华侨学校为其免除学杂费、提供免费教科书、对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寄宿生活费补助,同时确保中小学能够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

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认为是塑造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培养未来领袖和创新者的温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兴建校舍变得至关重要。201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乡村教育“倾斜”政策,七星区教育局增加对华侨学校的补助标准和范围,提高华侨学校的办学标准,并加大了教学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保障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2018年桂林市七星区华侨小学改扩建一期,教学楼建设开工仪式在桂林市华侨旅游经济区华侨小学工地举行。据悉,七星区华侨小学一期工程总投资1400多万元,教学楼工程建筑面积3877.3m²,新建的教学楼为6层,每层都配备男、女卫生间^③。

①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西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西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人民政协网:“桂林七星区华侨小学改扩建一期工程建设开工”,<https://www.rmzxb.com.cn/c/2018-07-17/2114306.shtml>

教室12间,一楼设有医务室、广播室,二楼到六楼配有教师办公室,五楼到六楼配置音乐、美术、体育、信息、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等功能室9间,2019年8月底竣工交付学校使用^①。

2021年华侨小学与周边农村的小学开始合并,其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集中和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使得孩子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其背后的一部分原因:首先,华侨学校的生源最初是归侨及其子女,但是随着归侨的老去,而且没有新的归侨来到农场,所以在生源上已经无法满足一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其次,周边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镇,为方便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有的人定居在了城市,农村村落萧条,留守老人和儿童无人照顾。在这两个原因的催生下,华侨小学与周边的农村小学进行了合并。在国家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合并后华侨小学办学条件日益改善,不管是在教学设备上,还是教师资源配备上和生源上都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华侨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显然成为了农村与农场之间连接的纽带和桥梁,华侨学校存在的意义更加重大。

结论

纵观广西桂林华侨农场华侨学校经历了从农场领导时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中多次变迁。自“三融入”体制改革提出以后,其为华侨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三融入”体制改革驱动下,华侨学校从内部到外部、从管理到运营、从教师到学生等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趋势下华侨学校从“孤岛”到“融入”,即华侨学校融入当地社会的表现。在农场领导时期再到后来各个发展阶段,华侨学校在农场范围内围绕农场为中心开展的教育活动长时间处于主流趋势,但是在“三融入”改革的驱动下,华侨学校多元化的发展促使华侨学校更注重教育本身。并且依托七星区教育局教育资金的支持,华侨学校实现了全面教育和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转型。此外对于华侨学校而言,在成立阶段充分尊重和传承了华侨文化的精髓。这个阶段强调了华侨学校的华侨文化责任,将华侨特色融入到教育体系中,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全球化时代具备跨文化素养。在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华侨学校走出了自治区侨办的管理,实现了管理独立。这一过程强调了学校的自主权和自主发展,使学校能够更好地根据自身需求和使命进行教育实践和改革。最后,在“三融入”改革阶段,华侨学校回归到地方教育管理体制下,但依然保持华侨特色。这一阶段强调了学校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和发展,使学校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充分发挥其优势和特色,为地方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郑雨来)

^①资料来源于笔者2022年7月24日与桂林华侨农场H先生访谈。

Key words: Australia; Chinese Immigrants; Demographic Structure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Qiaogang Town Zhang Zhenchang Kang Haining (38)

Abstract: Qiaogang Town in Beihai City, Guangxi,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970s as a settlement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has since become an important fishing production base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With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to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Qiaogang Town ha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is has made tourism, in addition to fishing and seafood processing, another important driv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own. When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Qiaogang Tow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courageously transformed its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is has served as a good example for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 in the Beibu Gulf region.

Key words: Beibu Gulf Fisherm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Industry; Qiaogang Town

The Development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Hometown Meizhou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 Ye Xiaoli (46)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s lifting of maritime restrictions,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returned home,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overseas businessmen, Chinese workers, and refugees. After returning, they used their knowledge, funds, and technology to actively lead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cultural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In the new journe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Dream, inspiri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Meizhou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izhou.

K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Meizhou;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of Three"

—With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Guil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Moxian (52)

Abstract: The school of the Guilin Overseas Chinese Farm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with the initial purpose of addressing the education need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childre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e school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ducation.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system reform was proposed in 2007, the education at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experienced new transforma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funding sources became the main focu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school.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eform process eliminate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diverse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region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this reform marked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kin to a "rebirth," and also facilitated a deeper integration of the school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uilin Overseas Chinese Farm

Analyzing Chinese New and Old Immigrants in Six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Gao Weinong (59)

Abstract: During the traditional era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entral America, overseas Chinese mainly originated from Guangdong, with a predominant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and a lesser presence of Hakka people. After the 1950s, when several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did no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part from immigrants from Taiwan, few individuals migrated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these nations.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mainly relied on internal natural growth to sustain their roots, leading to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ethnic Chinese.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ve been few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Central America, primarily from Guangdong, whil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have been relatively more numerous.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relatively unfavorable for Chinese im-